

村里来了当兵的

□叶展韵



悠悠往事

有一天下午，村里来了两个当兵的，他们背着枪。当时，几个人正在村西头的大槐树下聊天，一看来了当兵的，他们撒腿就跑，比兔子还快，像一阵风似的。拉二胡的柳爷爷还没有来得及收拾好他的二胡，就被这两个当兵的给抓住了。被抓住了就要跟着他们走，去当兵。

逃走的几个人知道柳爷爷没有跑掉，赶忙去找柳姓会首（会首是指旧时村里一姓的头领）去解决这个问题。哪能去当兵呢？家里的孩子还小，地还需要人耕种，一家老少总不能喝西北风吧。

柳姓会首来到了大街上，看到两个当兵的背着枪，正扯着柳爷爷的衣领，在推搡着，凶神恶煞，骂骂咧咧的。

“老总，有话好说！”柳姓会首双手抱拳，向两个当兵的哀求道：“他家里的孩子还小，不能跟着老总去当兵啊！”

“不能去？”一个当兵的问道。“实实在在不能去呀！老总行行好，放他一马吧！”柳姓会首继续哀求。

“那好，交钱！两块大洋！”一个当兵的嚷道。

“请客！交钱！两块大洋！”另一个当兵的早已不耐烦了。

“好说！好说！”柳姓会首哭丧着脸继续哀求道：“先叫他回家，这个钱一定交！”

两块大洋，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柳爷爷在两个当兵的押送下回到了家里。家里人一看来了当兵的，吓得魂飞魄散。在柳姓会首的帮忙下，赶紧杀猪、杀鸡、买酒，倾其所有招待这两个当兵的。

晚上的美味佳肴十分丰盛，是村里所有柳姓人家凑的好烟、好酒、好菜。酒足饭后，两个当兵的抹了抹嘴，拿着两块大洋和两大包好吃的心满意足地走了，柳爷爷这才没有被抓去当兵。

几年后，一天中午，村里又来了当兵的。一看来了当兵的，村里的人作鸟兽状一哄而散，纷纷跑进山里躲了起来。没来得及跑掉的只好在家里插着门，大气也不敢喘，更不敢出门。

这次来的当兵的有男有女，一共十一二人。

他们来到村里兵分两路，沿着村子高声喊道：“老乡，我们不打人不骂人，不要害怕！”然后他们集合在村西头的大槐树下，整整齐齐地站成一队，拍着手唱歌。唱完歌后看看大街上还是没有一个人，于是又挨家挨户地敲着门说，他们不打人不骂人，叫躲藏在外面的乡亲们回家来。

开始是胆子大的出来看：果然是不打人骂人。接着人们奔走相告：这次来的当兵的和上次来的不一样，他们真的不打人不骂人。于是人们纷纷跑到山里喊，这次来的当兵的不打人骂人，并喊他们都回家。

躲藏在山里的人们将信将疑地回村了。

在村西头，人们看到大槐树下有十一二个当兵的，男的女的都有。他们穿着朴素，面带笑容，和蔼可亲。他们的肩膀上都背着枪，有的站着用手打着拍子在唱歌，有的坐在一堆木头上休息。见了村里的人，他们就亲切地说：“不打人不骂人！”人们这才放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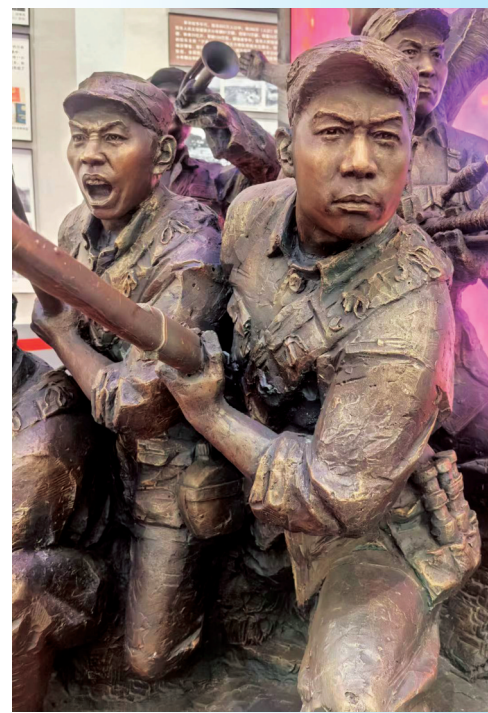
这是去年大年三十那天，92岁的父亲给我讲的他小时候的事情。虽然已经过去80多年了，但是对历史的温情和敬意，仍然萦绕在父亲的心头。

第一次来的是国民党老蔡的兵，蔡晋康的部队，也是蒋介石的兵。那时他们盘踞在唐家泊和牙山后面的村庄一带。他们在这里横行霸道，进村就搜刮钱财，不管老百姓的死活，谁见了谁怕，不死也要脱层皮。

第二次不用说你也猜到了，来的是八路军，是共产党的队伍，是毛主席的队伍。自打八路军来了以后，老百姓这才过上了安稳幸福的好日子。

当讲到老蔡的兵进村的时候，父亲悲愤填膺，表情严肃，充满了惊恐和愤怒；当讲到八路军的战士来村里的时候，父亲如尝美酒而陶醉，脸上的皱纹舒展开了，情不自禁地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我读懂了写在父亲脸上的表情，那是父亲发自内心的对国民党部队的深恶痛绝和对八路军的十分热爱，这表情自然流露，真诚，不做作。我也将牢牢记住父亲给我讲的故事。



(资料片)

莱州吕海寰与中国红十字会

□刘铁军



很少，吕海寰在家书房里招募童数人教读，“每日不过制钱两吊而已”。吕海寰则因昼夜焦劳，右腿生出恶疮，接着又接连病瘟，竟卧床一月有余，后在其嫂侯氏的精心护理下方得以痊愈。

二

早在吕海寰5岁那年，其母李氏为其聘定其次子李同照之女乃心为妻，后因家贫未能成礼。1861年底，为度岁祭祀，吕海寰向其族叔吕十爷借“五供”（铜或锡制的蜡台、香炉等）一份，用后因一时手边窘迫，将五供置于当铺，转年上元节筹措银钱赴当铺赎回，被当铺诬指该物为盗赃，送交县署究办。实际是李同照嫌吕氏家贫，意图悔婚而勾结当铺主人等合谋诬陷，构成罪状以为悔婚之借口。后经县学生具保释解。年已20岁的吕海寰决意离家赴京谋生。临行前，其未婚妻李乃心送来首饰一包，助其资斧，并誓言从一之志，决不悔婚。

1842年至1861年是吕海寰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在家乡的艰苦生活，使吕海寰养成了积极进取、吃苦耐劳、求真务实、正直诚信等优良品质。吕海寰中举后，于1868年夏回籍省亲，立旗悬匾，并迎娶妻李乃心。一时间贺者盈门，嘉宾络绎不绝。1869年7月间，吕海寰以检举人资格纳资捐了事。当年秋天，吕海寰的父亲病歿，吕海寰回乡将父亲安葬后即返京，继续教读生活。

大杆号达人黄作令

□张荣起

修、林锡恩、林宝福等人也对大杆号跃跃欲试。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一有时机就向稍懂此行的人请教技法、门道，有时熟人办喜事，就趁帮忙的机会接近吹手，刨根问底，寻求捷径。

凡事开头难。黄作令等人欲组一个大杆号班子又瞻前顾后，幸有山西乔村胡庆宽的鼎力支持。此人深谙民间习俗，知多见广，热心民间艺术的传承事宜，并帮大家出谋划策，主动指引迷津，增加了大家的信心。胡庆宽说：“光有信心不行，必须实地去干，才知自己的水深浅。”他建议大家凑份子，先买几件家伙，练练再说。黄作令铁了心要干，立马向姐姐借了380元钱交上，首批置办了4支大杆号，两支唢呐，小号、长号各一支，笛子一盒。时值1994年4月，庙后村从此有了大杆号班子。各人根据自己的兴趣选练一项，每周集中一次，相互交流，取长补短。

不料黄作令把大杆号带回家，妻子并不支持他干这行，怕耽误营生，并放出狠话：“再让我看见你拿回家来，我非给你砸了不可！”黄作令只好把大杆号藏在山里，干活休息时取出来练。空阔的山谷，反而有助于他发音和气力的训练，并且他的悟性超常，很快找到了用舌和唇发音的要领及用气的窍门，几经体验便运用自如，吹出来的曲子抑扬顿挫，激昂动听。

三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经济逐渐繁荣，栖霞苹果的分园到户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也带来了文化生活的复苏，民间文艺艺人又有了靠一技之长赚钱的机会，庙后大杆号新手也赶上了实践表演能力的机遇。邻村有个高龄老人一辈子好乐，儿子不行他做寿，黄作令获悉后，对伙伴们说：“咱们都练了这么些日子了，是骡子是马总得拉出去遛遛。”于是一行14人的乐队就免费为这位老人表演了一上午，老人很是开心，管了一顿饭，还给了200元的辛苦费，庙后大杆号终于迈出了公开表演的第一步。

大杆号毕竟是难度较大、非寻常人所能驾驭的一种乐器，随着市场的需求越来越复杂，有的因技能不过硬被市场淘汰，有的因挣钱不多自动离开，渐渐地，一直坚持并执着追求至今的只剩下黄作令一人。黄作令遵照父亲送他当兵时的要求，百尺竿头再进一步，百折而无悔。他苦吹了半年多，吹出了胃穿孔，住院做了手术，没等拆线就急着出院继续吹。后来有一个寒冬，因去烟台开发区表演，遭遇重大车祸，造成腿骨骨折、手指多处骨折、两根肋骨断裂、大腿肌肉重度挫伤，住院半年，出院后继续练。

黄作令自学大杆号的事迹不仅在当地出了名，还传到了大杆号的发源地——中桥（今属福山区）开发区水道观村第四代传人王金友、王金友弟兄的耳朵里。兄弟二人出于好奇，驱车60余里来到许家台黄作令家，一观究竟。黄作令的技艺得到了嫡传行家的认可，并获取了改变命运的两大大信：一是随着市场的需求越来越高，一个好的吹手才会吹大杆号不行，还要吹拉弹唱一专多能；二是要提高

1862年至1869年是吕海寰成长历程中的重要阶段。取得顺天府户籍、中举、捐纳主事，是吕海寰发奋读书和友人帮助的结果，也是其一生的重要转折，它不仅使吕海寰逐步摆脱了贫寒的教读生活，也奠定了他晋身清末政界的基础。

三

吕海寰任常镇通海道时就曾致力于社会福利事业，如创设保婴局、京口救生会，开发荷花塘船坞等。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此时，已是工部尚书的吕海寰正在上海任会办商约大臣，他与同任商约大臣的工部左侍郎盛宣怀和驻沪会办电政大臣吴重熹，邀约上海官绅和各驻沪机构代表共同协商，于1904年3月10日正式成立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此为“中国红十字会”之始。该会属慈善性质，由中、英、美、德、法五个中立国合办，直接目的在于救护日俄交战双方伤员及帮助东北战地难民出境医治。日俄战争两年间，共救护46.7万余人出境。光绪帝曾发上谕，“颁发内帑十两”作经费，以为褒奖。1907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改名为“大清红十字会”，吕海寰任会长。1910年改“大清红十字会”为“中国红十字会”，清政府委派其副手盛宣怀为会长。辛亥革命爆发，清廷又改派吕海寰出任会长，会同总董沈敦和、福开森办理战地救护事宜，派出医疗队驰赴武汉。武昌一役，治疗伤者数千人，掩埋尸骸8000余具。1912年1月，中国红十字会获得立案，2月正式获得承认。10月，南京临时政府以袁世凯总统令的形式任命吕海寰为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此后，吕海寰领导红十字会在国内主要进行救灾事宜，如1912年浙江水灾，1917年皖北大水灾，1919年苏、浙、皖、鄂水灾的救、医、赈，均成绩斐然。

早在红十字初创时期，吕海寰即为中国加入国际红十字组织多方奔走。1904年8月12日，日内瓦万国红十字会会长、副会长联名具函，言中国入会一事业已成，瑞士联邦已按照万国公例布告在约各国，但最终未予正式承认。在吕海寰的不懈努力下，1912年1月15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正式通过并承认中国红十字会。1919年7月8日，中国红十字会正式加入各国红十字协会（现称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此后，吕海寰领导红十字会积极开展了国际救济活动。1914年捐款救济欧战难民和日本鹿儿岛地震难民，1920年8月救助俄属庙街2000余名避难华侨和驻外领事、军舰，都赢得国际社会的一致赞誉。1920年9月，年事已高的吕海寰辞去了会长职务，仍被公推为名誉会长。此后吕海寰定居天津，1927年1月病逝，享年85岁。次年归葬家乡山东掖县。

表演效果需打破地域界限，抱团发展。从此，黄作令的视野开阔了，活动轨迹也改变了。

唱歌本来就是黄作令的强项，有部队和学生时期宣传队打下的基础，稍微一发挥就足够应付表演。学二胡对黄作令来说有一定难度，因为他不识乐谱，但如今，同一首曲子，他能用G、D、C、F调演奏得十分出色。这是为什么？道理和吹大杆号一样，除了有悟性，他是无时无刻不求师，时时刻刻与同行取长补短，超越自我。黄作令说：“高手在民间，只要虚心跟他们求教，就能学到真本事。”

三

进入2000年，农村办喜事兴起抬花轿之风，随之掀起一股吹唢呐的热潮。是年4月，黄作令买来了唢呐，白天在家练，晚上骑自行车跑十公里去老师那里学习。后来听说与笙合练长进快，便先后去过杨家赤村林训修和骂阵口村孙相生那里合练，彼此长进都很大。

黄作令又买了卡拉OK，跟着吹、拉、唱，有时照着镜子对口型，对着视频找感觉，简直着了迷。当时农村吹手中缺的就是大杆、唢呐、演唱方面的人才，黄作令又是全能，所以接的活一年比一年多，最多时一年近300天不在家。老婆跟着受苦也再无怨言，从心里承认丈夫当初的选择是对的。

黄作令还有一个绝活，全胶东的大杆号班子无人能及，他会倒立唱歌、吹大杆号、吹唢呐、喝啤酒、喝矿泉水、吞烟吐雾等特技表演。原来，黄作令8岁时跟着老师去福山学演节目时学会了倒立，后来在中学体育课及部队练兵时都有此类运动，已训练有素。干上吹手以后，为了镇住场面，便吸收杂技演员之长，掺进特技元素，提升了乐队的演出质量。

最使黄作令感到不负父亲“行行出状元”所望的是，自己的表演使大家过目不忘。他天生带戏，喜事唱得大家笑，丧事唱得人落泪，所到之处没有不喜欢老黄的。有时缺了他，群众还会打听“老黄咋没来”。

黄作令认为，与大杆号嫡传师傅王金友的师徒情缘，是有生以来最大的成功。俗语云：“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黄作令成为好吹手以后，经常被水道观的嫡传班子喊上同队演出，时间一长，王金友发现这个年轻人既勤快又虚心，就有意带他。一个爱学，一个爱教，一对师徒就这样结成了。现在，黄作令处处发扬师傅之所长，先后带过12个徒弟，其中有一个已经达到全能的水平。黄作令决心将这一老辈传下来的非遗项目，传承下去。

三年疫情期间，大杆号队伍曾一度萧条，好在如今已经开始好转。黄作令告诉笔者，今年春节期间，他参加了包括毓璜顶庙会、烟台山庙会在内的8场表演，其中有3次是他牵头组团的，活动频率已恢复疫情前的状态。由此可见，文化生活与经贸市场是一对孪生姐妹，息息相关。

吕海寰(1842年至1927年)，字镜宇，山东掖县(今莱州市)西南隅村人。

清末著名外交家、中国红十字会创始人，历任驻德国、荷兰两国公使，工部尚书、兵部尚书、外部尚书、钦差商约大臣、督办津浦铁路大臣，大清红十字会会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中国红十字会名誉会长等职。

吕海寰(1842年至1927年)，字镜宇，山东掖县(今莱州市)西南隅村人。清末著名外交家、中国红十字会创始人，历任驻德国、荷兰两国公使，工部尚书、兵部尚书、外部尚书、钦差商约大臣、督办津浦铁路大臣，大清红十字会会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中国红十字会名誉会长等职。

1842年7月12日，吕海寰出生在莱州府掖县(今烟台莱州市)西关粮食市(后因建府地于西南隅，故称其为西南隅村人)一个没落的低级幕僚家庭。其祖父吕书城虽然勤苦，但屡试不第，中年以后外出游幕，喜好扶危济贫，故“作幕一世，毫无积蓄”。吕书城有4个儿子，小儿子吕晋陟(吕海寰父亲)长期在外谋生，以教读为业，为人忠厚，“凡贫苦朋友来告贷者，往往典衣节食以济之”。吕晋陟育有两子，吕浪寰是长子，吕海寰是次子。1844年吕晋陟外出游幕时，吕海寰只有3岁，母子三人相依为命，历尽艰辛。

吕海寰自幼聪慧异常，8岁开始读书。最初与其兄同在街北刘焕章宅内，跟当地塾师罗文溶学习。1851年，72岁的吕书城游幕回到故乡，吕海寰兄弟即在其祖父的指导下读书。在吕书城的严格要求下，吕海寰读书“工夫颇见进境”。1854年，12岁的吕海寰参加童子试，结果被“邑侯拔置前列”，府试亦在20名内。虽然在当年的院试中落选，但“见者无不以大器许之”。

就在吕海寰准备科举考试的关键时刻，其祖父却病倒了，加上在外谋生的父亲已不能“按时寄银养赡”，“家道益窘”。1856年，吕海寰被迫辍学。其母李氏担心他们的学业半途而废，就与当地名士宋星槎先生联系，吕海寰得以跟从上课。在宋先生的着意训导下，吕海寰开始用力于大家制艺，参加“考书院，亦往往得高列，所得奖赏悉心奉母”。然而，祸不单行，就其祖父去世后不久，李氏也因操劳过度而患病，这使他们本来就十分贫寒的生活更加艰辛。母子三人只能依靠兄弟二人微薄的教读收入来维持生计，而二人每年所得束修之资，仅有制钱30串，其生活之艰辛程度可想而知。

1860年，风传英法联军要进攻莱州，警报不断，人心惶惶。李氏的病情急剧恶化，于1861年1月31日去世。不久，捻军势力发展到邻县潍县，掖县又一次人心大惶，谣言四起，一日数警。掖县知县许乃恩联合当地绅商兴办团练，吕海寰兄弟即参加团练，司笔墨事。后来，由于掖县实行坚壁清野，凡居关厢者均移居于城内，兄弟二人只得连夜匆匆将其母亲掩埋。吕海寰与其兄嫂一起到城内大舅父家的磨坊暂时借居。兄弟二人昼夜巡城，“每日只得百数十文，赖以生活”，苦不堪言。兵荒马乱之后，上学的人

身长近3米的大杆号，据说为胶东独有，而胶东也只有蓬莱和栖霞两地的几处村落靠祖传沿袭了这一传统项目。其费气力之大、含技巧奥妙之深，令好多感兴趣的年轻人望号兴叹。如今真正能上得去场、顶得起个的吹手，越来越少了。栖霞市庙后镇许家台村的黄作令，从自学起步，成为为数不多的吹手。

黄作令还有一个绝活，全胶东的大杆号班子无人能及，他会倒立唱歌、吹大杆号、吹唢呐、喝啤酒、喝矿泉水、吞烟吐雾等特技表演。原来，黄作令8岁时跟着老师去福山学演节目时学会了倒立，后来在中学体育课及部队练兵时都有此类运动，已训练有素。干上吹手以后，为了镇住场面，便吸收杂技演员之长，掺进特技元素，提升了乐队的演出质量。

在农村红白喜事及较大庆典活动那长长的鼓乐队伍中，往往有几对老长的大杆号在前面造势。身长近3米的大杆号，据说为胶东独有，而胶东也只有蓬莱和栖霞两地的几处村落靠祖传沿袭了这一传统项目。其费气力之大、含技巧奥妙之深，令好多感兴趣的年轻人望号兴叹。如今真正能上得去场、顶得起个的吹手，越来越少了。栖霞市庙后镇许家台村的黄作令，从自学起步，成为为数不多的吹手，其中有些故事鲜为人知。

黄作令出生于1960年，高中毕业后当过兵、种过地，后来在离家20多里外的滑石矿找了份下井挖滑石的工作，却依然为生计发愁。有一次，他从矿井里上来，突然听到了悠扬悦耳的喜乐声。他越听越爱听，登高一望，发现长长的鼓乐队前面，有六杆大杆号领着，另有唢呐、笙等其他乐器配合，吹吹打打，好不欢快。黄作令越看越爱看，直到队伍散去，他才缓缓离开。就是这次表演，触发了黄作令的某根神经，用乡下人的话说，就是看在眼里拔不出来了。尤其听说喜主会给表演队丰厚的酬劳，表演过程还时常有赏钱，到了谁家都是现钱“足”（给的意思），就更加动心了。此后，他便多方打听收集大杆号的相关信息，这才发现了此念头者，非他一人。除了本村的徐洪金、鲁付江、徐喜清外，周边村的王江波、王江卓、胡克军、林福恩、林训修、林宝